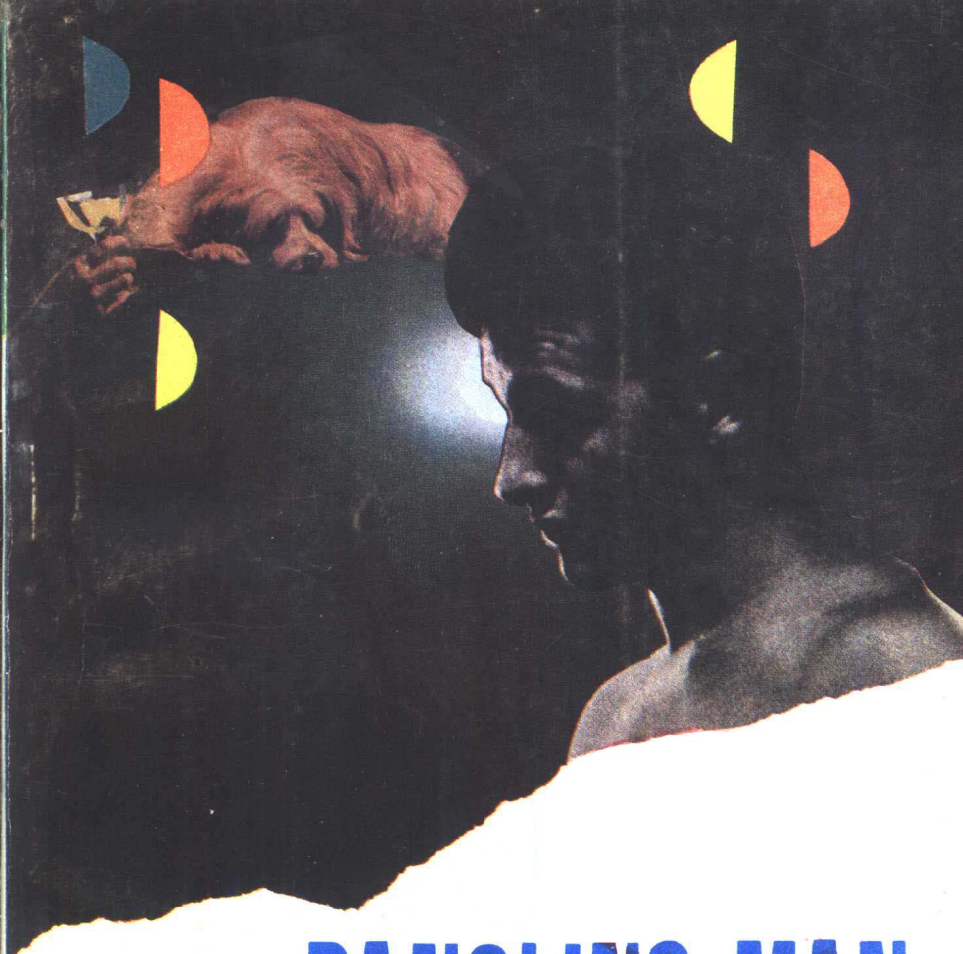




DANGLING MAN

挂起来的人

〔美〕索尔·贝娄 著

当代美国小说丛书

挂起来的人

〔美〕索尔·贝娄 著

袁华清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晓丹

封面设计：毛国宣

版式设计：王丹丹

责任校对：李 建

当代美国小说丛书

挂起来的人

〔美〕索尔·贝娄 著

袁 华 清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经 售 处

社科保定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33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册

统一书号：10190·222 定价：1.15元

出版说明

《当代美国小说丛书》是为配合本社出版的《当代美国小说家论》而编辑的一套作品丛书。《当代美国小说家论》一书，对美国当代小说界分属不同流派而又具有代表性的二十四位作家，进行了系统的论评；这套小说丛书则选收了《当代美国小说家论》中部分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所创作的有较大影响的小说，主要选收中篇、短篇小说，酌收篇幅较小的长篇小说。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使我国读者从中了解当代美国的社会现实、社会心理的演进，以及小说艺术在美国的发展状况。

本丛书的选题，是由钱满素同志帮助制订的，译者均为从事英美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外国文学工作者。

从自我怨忿到自我消失

(代译序)

读过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一九七六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九部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两部剧作，人们会得到这么一个印象：他的作品虽然基调互不相同，风格各呈异彩，但人物却总是相似的，他们大都经历着一个“从自我怨忿到自我消失”的过程。这里的“自我”指的是人物的性格和个性特征。也有人把这个过程叫做“从异化感到适应”。

贝娄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具有西方社会现代人的典型性格特征。开始时，他们痛苦地感受到这个“荒谬、冷酷的世界”和这个“丑恶、短暂的生存”的重压，发现自己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和周围的人疏远隔膜。简言之，他们有一种异化感和疏隔感。于是，他们便通过各种方式——在《赫索格》中是通过向死人和活人、美国人和外国人、著名人物和市井小民书写一封封从未寄出的信，在《挂起来的人》中是通过写内心独白式的日记——对社会和人生发出一个又一个怨言。这就是所谓的自我怨忿。

然而，正如索尔·贝娄本人所言，随着时序推移，“公众领域在侵犯私人领域时不断削弱个人的力量”，“技术的和政治的决定，看不见的势力，只有少数头面人物得以与闻

的秘密等等，使得私人意志变得孤立无助，并在私人领域里把个人引入种种怪异的行为形式”，人物的“异化感、疏隔感和不调和的个人禀性必然会导致适应”。于是，自我不再怨忿，主人公的个性消失，他们的不调和的性格与现实的某种形式之间达到了和谐，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和谐。这就是所谓的自我消失，或曰自我与环境的适应。雨王汉德森的重返美国，奥吉·玛琪的与现实妥协，《受害者》中的两个主要人物的接受社会的安排，赫索格最后的安于现状，以及《系主任的十二月》中的科德教授登上帕洛马山天文台时涌现的倦于斗争的心情，似乎都是“自我消失”的例证。

《挂起来的人》是贝娄进入文学殿堂的敲门砖，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它由于基调低沉抑郁，风格上带有较多传统色彩，而有别于作家日后推出的作品——长篇小说《受害者》（1947年），《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年），《莫失良辰》（1956年），《雨王汉德森》（1959年），《赫索格》（1964年，另译《何索》），《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年），《洪堡的礼物》（1975年），《系主任的十二月》（1982年），短篇小说集《莫斯比的回忆》（1968年），剧作《最后的分析》（1965年），《性中是否寓有希望？》（1967年）。然而，本书主人公约瑟夫经过的“从自我怨忿到自我消失”的道路，却在不同程度上被贝娄的其他作品中的人物所遵循。因此，著名评论家马克·谢克纳在《当代美国文学导论》中认为，“贝娄的所有作品可以统称为《挂起来的人》”。

这部篇幅不长的日记体小说描绘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美国青年的苦恼和他为自己找到的解脱方式。约瑟夫

大学毕业后任职于美利坚国内旅游局。征兵令下达不久，他即辞去职务，等待应征入伍。荒唐的规章制度和莫名其妙的规定使他整整等了一年，从头年五月等到来年四月。在此期间，他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尝尽了被“挂起来”、隔绝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痛苦。“他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象是躺在一朵云彩下仰望着它。”约瑟夫囿于四壁之间，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日子确实失去了它们的特性”，他“已经倦于把某一天说成是‘我又要了一杯咖啡的那天’，或是‘女仆不愿意把烤焦的面包端回去的那天’了”。绝对的自由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时间中变成了绝对的不自由，甚至他的身份也因为他已辞去工作而成了问题。为此，银行拒绝给他兑现支票，哥哥在他面前摆出施主式的怜恤姿态，侄女骂他是“叫花子”。为了恢复自身的独立性，他希望暂时回原单位工作，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与此同时，昔日的党内同志把他当作不屑一顾的叛徒，房东对他横蛮无礼，妻子和他若即若离，情妇也离他而委身于他人。凡此种种，使他深深陷入苦闷、烦恼和孤独的泥淖中，使他的异化感和疏隔感与日俱增。

约瑟夫用写日记的方式，把自我的怨忿书之于笔端；他的日记“充塞着对独立自主的自我遭受的种种灾难发出的怨言”。他也记述了自己的追求和希冀。“我应该知道我自己是什么”，“知道我们是什么和我们要干什么，知道我们的宗旨。”可惜的是，他始终没有找到答案，也无法找到答案。约瑟夫的希冀寓于一个朦朦胧胧的“理想构筑物”中，但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理想构筑物”到底是什么。怨忿之余，他千方百计寻求解脱的办法。他向征兵局申请尽快入伍。通知书终于拿到了手，约瑟夫迫不及待地准备去

“适应”现实对他作出的安排，而在不久前，他还谴责自己的好友“适应环境”。这是约瑟夫的“行为的怪异性”所在，也是他的悲剧。但他却为“自我的消失”而欢欣雀跃，因为他坚信参军入伍可以使他“不再为自己担负责任”，“卸下自己作决定的重负，解脱自由的束缚”。难怪他的入伍前的日记以三句欢呼结束：

“乌拉，遁规蹈矩的日子！”

乌拉，精神监督！

军团生活万岁！”

约瑟夫并非现代概念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牺牲品。他的异化感和最终的怪异适应，他走的那条“从自我怨忿到自我消失”的道路，在二十世纪的不少文学作品中有迹可觅。索尔·贝娄的功绩在于，他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起了承前启后作用，具有典型意义。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不无道理地指出：这本小说是“在经济恐慌时代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心理的最忠实的证明”。

作为索尔·贝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挂起来的人》预示着作者将在写作技巧上作出大胆的探索，这种预示是由本书的许多反传统段落提供的。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作者对文学现实主义的反叛。约瑟夫的日记固然按时间顺序排列，但在一天所记的内容中，时序却往往被打乱。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技巧的运用，大大拓展了时间的横断面，使过去、现在和将来统统混在一起。现实主义作品中常见的对环境的逼真描写和对人物形象的清晰刻划在《挂起来的人》中很少看见。一切都以朦朦胧胧、模

糊不清的形式出现，一切都为营造某种气氛、传达某种情绪服务。甚至连约瑟夫的希冀也通过怪诞的方式来表现：“理想构筑物”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概念便是在约瑟夫与他的“替身精灵”的对话中提出来的。作者除了在二月三日和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让主人公与他的“替身精灵”交谈外，还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让约瑟夫用第三人称“他”来介绍和评价自己。这些反传统的写作技巧使贝娄得以摆脱时间、空间、逻辑规律乃至伦理习俗的束缚，大胆而自由地从各个不同角度窥探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揭示人物的性格和意识。贝娄在评论詹姆斯·琼斯的《纤细的红线》时说：作者巧妙地、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一系列新颖的表现手法，使“全书保持着一种奇迹般的微妙的平衡，而不是一连串骇人听闻的事件使我们厌倦”。用这几句话来形容贝娄的《挂起来的人》大概也颇为合适。

应该指出，虽然本书中的女性形象——约瑟夫的妻子艾娃、侄女艾塔、情人吉蒂等等——略嫌单薄，似乎既缺乏容颜体态的具体描写，又没有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但她们对突出主人公的形象却起到了很好的烘托和衬垫作用。没有她们的出现，约瑟夫的异化感、疏隔感和孤独感就不能表现得象现在这样深刻和淋漓尽致。

索尔·贝娄几年前在和一位外国作家谈话时承认，他的每部小说都糅有自传因素。《挂起来的人》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对贝娄的生平并不陌生。一九一五年七月十日，他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附近的拉辛纳城，九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芝加哥，中学毕业后相继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二次大战时在船队工作，战后长期执教，一九六八年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我们

发现，本书主人公约瑟夫也是自幼移居芝加哥的加拿大裔美国公民，也在威斯康星大学念过书。约瑟夫答应妻子要求，去照料卧病在床的岳父；据说贝娄若干年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有趣的是，他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系主任的十二月》中，写了一个大同小异的情节：科德教授到布加勒斯特探望病危的岳母。约瑟夫和妻子的关系不融洽，“我们早就不再彼此交心了，事实上有许多事情我不能对她提起”；贝娄在婚姻问题上也几经波折，据说曾三次离婚，四次结婚。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在《挂起来的人》和贝娄的自传体小说之间划等号，更不能认为约瑟夫就是作家本人的自然摹写。例如，我们在贝娄身上就没有发现“从自我怨忿到自我消失”的演变过程。相反，贝娄是一位有抱负、有个性、让自我充分表现的作家。他以“揭示生存境况的秘密”为己任，希望“自己写的书是对同时代人的一种评价，表现出对某些倾向的支持和对另一些倾向的反对”。他对自己提的要求是，每部小说都应该“是一部更高水平的自传”。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索尔·贝娄在接受美国记者角谷美智子采访时，讲了这么一段话：“我有时喜欢说，任何人的生活都可以用十来个妙趣横生的轶事来概括。有一个轶事我最喜欢。讲的是一位崭露头角的美国歌唱家在拉斯卡拉剧院首次演出的情况。第一首咏叹调唱毕，全场报以热烈掌声。观众高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他唱了第二遍。但观众继续要求他重唱。于是他唱了第三遍，第四遍……最后，他累得精疲力倦，上气不接下气地问：‘这首歌我到底还得唱多少遍呢？’有人答道：‘直到你唱准确为止。’我就是这种情况——我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唱准确，所以我要继续唱下去。”我们知道，索尔·贝娄由于写了《挂起来的人》而

一举成名，在美国文坛牢牢站稳了脚跟；由于刻划了一系列“从自我怨忿到自我消失”的人物形象而获得三次国家图书奖，一次福门托奖，一次普利策奖和一枚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由于他的作品“对人类的了解和对当代文化的湛深分析”而荣膺一九七六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他讲的这番话当然是过谦之词，我们应该从中悟出深一层的含义：他不会象自己的主人公那样，听凭自我消失，牺牲自己的人格，去适应环境；而要继续挥动如椽之笔，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更深刻、更具有典型意义的西方社会现代人的形象。那次采访后不久，贝娄推出了他的第九部长篇小说《系主任的十二月》；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轰动了整个欧美文学界。我们期待着这位“继海明威和福克纳之后最伟大的美国作家”的第十部长篇小说尽早与读者见面。

译者

1985年7月于北京

当代美国小说丛书
部分书目

九故事
挂起来的人
再见，哥伦布
囚犯
秀拉
爱的轮盘

杰·大·塞林格
索尔·贝娄
菲利浦·罗思
库尔特·冯尼格
托妮·莫瑞森
乔·卡·欧茨

内 容 简 介

主人公约瑟夫在无休止的征兵等待中成了被社会“挂起来”的人，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与妻子、情妇、亲戚、朋友、邻居发生各种冲突；他咀嚼着无所事事、无所依傍的孤独和痛苦，思索着人生的意义、人类的命运。小说以日记体形式，在淡化了的故事轮廓中展开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现代人敏感、复杂的心理特征，揭示了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苦闷、惶惑的精神状态，富有哲理意味。作者索尔·贝娄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擅长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糅合在一起，表现资本主义国家异化了的世界中人的精神危机。本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这一创作特点。

1942年12月15日

人们先前有经常向自己倾诉心声的习惯，不着于把自己的隐私书之笔端。但如今记日记却被认为是一种自我迁就，是性格懦弱和趣味低俗的表现。因为这是一个无情的时代。今天，运动员的准则，强悍小伙子的准则——我相信这是美国人从英国绅士那儿得到的遗产——比任何时候都时兴；这是拼搏、禁欲和严守纪律的有趣混合物，有人把它上溯到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你有感情吗？表达感情的方式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你有内心生活吗？这是你个人的事，与旁人无关。你有激情吗？把它压抑下去。大家都或多或少地遵循这个准则。这个准则只允许一种有限的坦率和一种保持缄默的耿直的存在。但它对最真诚的坦率有抑制作用。最严肃的事情接近于粗暴。人们不精于内省，因此没有做好与对手打交道的准备。他们不能象对待目标很大的猎物那样朝对手开枪，也不能有勇无谋地蛮干。

你若有困难，应该默默与它们斗争——这是他们的训诫之一。见鬼去吧！我只想提一下我遇到的麻烦事。即使我的嘴巴多如涅婆^①的手臂，即使我能一刻不停地让它们絮叨，我也不能说服别人给我以公正的评价。我现在心情沮丧，对

① 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译注（下同）

我而言，记日记，向自己倾诉衷肠，是十分必要的。我丝毫不认为这样做就算犯了自我迁就的罪过。粗俗的人不会用言语抒发情愫，但作为补偿，他们会开飞机、斗牛、捕海鲑。而我却连自己的屋子也很少离开。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几乎一辈子，还会感到孤独。可我在这里却确实是个孤独者。我每天在蜗居斗室中独自捱过十个钟头。这种地方都这样，并不算坏，但具有标准公寓的种种恼人处：菜味，蟑螂，古怪的邻居。但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对这三样东西逐渐习惯了。

我的书源充足。妻子总给我提供新书，并希望我能物尽其用。我何尝不愿这样做。当初我们自住一单元时，我不停地看书，不停地买新书。我承认，买书的速度快于看书的速度。只要身边有书，我就肯定能享受到一种范围更广的生活，一种比我的日常生活可贵得多和必要得多的生活。即使我不能每时每刻都享受这种高级生活，起码也能把它的迹象实实在在地留在我的心间；当这种迹象在实际中变得淡漠时，我就照样能在自己心间看见它们和抚摸它们。然而，尽管我现在时间有余，可以从事一度曾经开始的研究工作，但我却没有看书的心绪。书籍不再对我有吸引力。翻了两三页，有时甚至浏览了两三段，我就失去了继续看的兴致。

从我响应征兵号召，辞去美利坚国内旅游局的职务，到今天已经过了差不多七个月。但我却还在等待中。这种事司空见惯，是一部煞有其事的官僚主义闹剧——起先我持这种态度。事情始于今年五月，我被征兵局退回来了，因为我的证件有问题。于是，我象得到了假期，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我在美国住了十八年，但仍旧是加拿大人，一个不列颠

王国的臣民。我虽然是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外国人，但未经多方调查稽核，也照样不能入伍。等了五星期后，我请求美利坚国内旅游局的麦伦德先生重新录用我。但他说，近来营业额锐减，就连干了许多年的特雷格先生和比绍普先生也已被他不得已辞退，所以他可能帮不了我的忙。九月底，我接到书面通知，说已对我进行调查，没发现问题，我需要按规定再去验一次血。一个月后，我又接到通知，我已编入 1 A 组，需作好入伍准备。我重新开始等待。但等到十一月仍然音信全无，经询获知，根据一项与已婚男子有关的新规定，我的入伍日期需推迟，我要求重新编组，申明我已辞去工作。经过为时三周的解释，我编为 3 A 组。在此之前（确切地说是一个星期前），我又奉命验了一次血（每次验血结果的有效期限只有六十天）。就这样，我转了一圈回到了原处。我相信这件恼人的事不会很快结束，会再拖上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

这段时间内，我妻子艾娃供我吃穿。她声称这不是负担，她希望我能利用这段自由时光看几本书，做几件入伍后不能做的事情。大约一年前，我立下雄心壮志，写过不少文章，主要是启蒙时期各大哲学家的评传。我是在狄德罗评传写到一半时，响应征兵号召搁笔的。现在即然我被“挂起来”了，那就隐约意味着我应该把文章继续写下去。艾娃不希望我另找工作，何况我已编组待命，怕也找不到一个合适工作。

艾娃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姑娘，她也有办法打消你的说话念头。我们早就不再彼此交心了。许多事我不能告诉她。我们有朋友，但不再和他们来往。有几个住在本市，但离这儿很远；另外几个住在华盛顿。一些人入了伍，还有一个侨居国

外。我的芝加哥朋友们和我经历不同，在不同的地方长大，所以我没有多少跟他们见面的愿望。我和他们之间的某些歧见也许可以消除，但一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已经松开；到今天为止，我没有得到系紧这条纽带的推动力。凡此种种，使我成了一个孤独者。我百无聊赖地安居斗室，提前等待一天中的那些鸡毛蒜皮似的“关键时刻”的到来：女仆的敲门，邮差的出现，广播节目，以及每天准时涌现的几个痛苦念头。

我想到过另找工作，但我又不愿承认，我这人精神世界匮乏，缺乏性格力量，以至不知如何享受自由，而不得不接受工作的奴役。最后那次重新编组时，我力图编入海军，但外国人人伍的唯一途径似乎是参加陆军。没有办法，只得再等下去，或者说继续处于“挂起来”的状态。意志日趋消沉，脾气越来越坏，这一切我都明白。痛苦和郁忿日积月累，几乎变成了一种强酸，侵蚀着心中尚存的热情和良善。不过，七个月的等待只是我心烦意乱的原因之一，源自等待的被“挂起来”的状态更加严重。只有把这条把我“挂起来”的绳索砍倒，才能从反面恰如其份地估计等待给我造成的危害。

12月16日

我开始发现，世界越活跃，我的动作就越缓慢。我的孤独感与世界的喧嚣和狂乱同步增长。今天上午收到泰德的妻子从华盛顿寄来的一封信，说是她丈夫飞往北非了。我一生中从来都不象现在这么不想动弹。我甚至不愿去烟店买烟，尽管我有强烈的抽烟愿望。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在等待入伍通